

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

江苏人民出版社

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江苏人民出版社

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00·207 定价 0.70 元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魯迅

目 录

鲁迅战斗的一生	(1)
鲁迅的杂文概述	(28)
鲁迅的小说概述	(47)
鲁迅的诗歌概述	(63)
鲁迅的散文诗和散文概述	(81)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 迅(95)

坚持斗争 永不休战

(109)

——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 迅(115)

彻底革命 永远进击

(120)

——读《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 迅(125)

革命者的长鸣警钟

(134)

——读《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伪自由书》后记

鲁 迅(142)

战斗正未有穷期

(176)

——读《伪自由书·后记》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鲁 迅(182)

讨伐孔家店的战斗檄文

(192)

——读《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三月的租界	鲁 迅(205)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反革命	(209)
——读《三月的租界》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鲁 迅(216)
鲜明的阶级爱憎 敏锐的政治远见	(221)
——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狂人日记	鲁 迅(226)
反封建斗争的宣言书	(240)
——读《狂人日记》	
阿Q正传	鲁 迅(247)
“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301)
——读《阿Q正传》	
祝福	鲁 迅(309)
旧社会劳动妇女的血泪控诉	(331)
——读《祝福》	
鲁迅年表	(338)
鲁迅在南京	(355)

鲁迅战斗的一生

鲁迅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一生。战斗，使鲁迅的一生迸发出灿烂的思想光辉；战斗，铸成了鲁迅巍然屹立的高大形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鲁迅英勇战斗的一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鼓舞着我们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长期作战，自觉而持久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当前，我们更应该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斗争经验，深入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大的胜利。

一

鲁迅，原名周樟寿（在南京上学时改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的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这时，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年代。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者勾结在一起，残酷地压榨、奴役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奋起反抗，阶级矛盾和

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激烈。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直接或间接冲击着鲁迅的家庭，使它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对鲁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因事被捕入狱，鲁迅不得不到乡下舅父家避难，被人称为“乞食者”，受尽了歧视。这给鲁迅很深的刺激。鲁迅十六岁时，父亲在生了三年重病以后去世，家庭经济状况急剧下降而至破产。重大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明白了许多事情”。他开始感受到“上流社会”的冷酷和腐朽。

鲁迅母亲的娘家在农村，使鲁迅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农村，和不少农民的孩子结下了真挚的友谊，了解到农民勤劳、朴实的优良品质，还亲眼看到劳动人民“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的生活，这使他后来一直深切地同情“下层社会的不幸”。

一八九八年，鲁迅十八岁，家庭经济情况更为艰难，“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当时一般知识分子认为读书应举才是“正路”。鲁迅由于对“熟识的本阶级”感到憎恶，毅然摒弃了没落的读书人家子弟常走做幕僚或商人这两条路，离开了故乡，前往南京求学，“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一个行动是鲁迅同封建阶级实行决裂的开端，也是鲁迅开始寻找革命真理的一个起点。起初鲁迅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这一时期，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高涨的时期。鲁迅阅读了许多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书籍。其中，特别使他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维新派著名学者严复译述的英国赫胥黎写的《天演论》。这本书对鲁迅早期思想发展影响很大，他批判地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中承认新陈代谢、发展变化的辩证因素，初步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

思想。

鲁迅在南京的几年里，民族危机和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内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一连串的重大政治事件，使青年鲁迅逐步认识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清政府卖国投降的面目，渴望着拯救危亡的祖国，解放苦难的人民。当时，一些先进人物形成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信念，也吸引着鲁迅。一九〇二年，他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强烈愿望，赴日本留学。

二十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兴起，东京是革命派在海外的一个活动中心。鲁迅一到东京，就受到反清革命气氛的强烈感染。他为了表示与封建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就把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剪掉，并在自己的“断发照”上写了一首《自题小像》诗。年青的爱国主义者鲁迅，身居异国，隔着万里海天，遥念“故园”，想着人民，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的战斗誓言，表示要用自己的满腔热血献给祖国独立、自由和进步的革命事业。

鲁迅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到离东京较远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想从医学入手，促进人民对于政治改革的信仰。严酷的现实使他的幻想破灭了。有一次，他从时事电影中看到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绑着砍头示众。而围着观看的一大群体格健壮的中国人，却显出麻木神情。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很深的一些日本学生看到这种情景以后狂热地高呼“万岁”。这给了鲁迅极大的刺激，一股不可遏制的爱国热情勃然升起，并醒悟到“医学并非一件

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认为当时“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决心弃医从文，立志以文艺为武器，提起战笔，迎着斗争的风雨走上了思想革命的战场。

鲁迅回到东京，着手提倡文艺运动。他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的激烈论战。鲁迅坚决站在革命派一边，先后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重要论文，对封建复古派和洋务派、改良派进行了深刻的揭发和批判。鲁迅看透了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反动实质，深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器可变，道不可变”的二元论，都是孔孟之道的变种。他指出洋务运动和改良主义道路“舍本逐末”，都不能救中国。他猛烈抨击了“耳新声而疾走”的“抱残守阙”之辈，对以孔孟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极端憎恶和鄙视，尖锐指出那种是古非今，“安分守己”的谬论，目的在于教人“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完全是为了维护气息奄奄的封建统治，束缚人民的手脚。鲁迅强调多做启发人民觉悟的工作，振奋人们的精神，去与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作坚决斗争。因此，他辛勤地翻译、介绍具有反抗精神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废寝忘食，通宵不眠。

一九〇七年，清朝反动政府鉴于保皇派在论战中遭到惨败，便暗中勾结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出境。东京的革命气氛日趋冷落，革命者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的领导者转移到了国内。鲁迅也就在一九〇九年夏，离开日本，返回祖国。

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和绍兴教书。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长期渴望祖国人民得到解放的鲁

迅,以极为兴奋的心情欢迎和支持这个革命。他组织学生“武装演说队”,走上街头,开展宣传,扩大革命影响。他当时以为,从此祖国可以得到新生,人民可以得到解放。然而不久,鲁迅就失望了。他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政权换了旗号,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使革命流于形式,“内骨子是依旧的”。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仍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辛亥革命不久,鲁迅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一九一二年五月,随部迁居北京。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篡夺了军政大权,紧接着又演出了一出短命的称帝丑剧。继之,张勋复辟,军阀连年混战,广大人民陷入了更痛苦的深渊。这一切使鲁迅极为愤慨和痛心。当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鲁迅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完全失望,但又看不到新的革命力量,看不清战斗的方向,于是苦闷、怀疑。然而这并非是退出战场的消极沉默,而是蕴藏着难以排解的爱国心情的积极等待,燃烧着无法按捺的向黑暗挑战的战斗烈火。他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深刻地思考着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渴望着战斗的历史能翻开新的一页!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以前,鲁迅时刻不忘为民族生存和独立而战斗。他是一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表现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鲁迅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由向往、参加而至失望,促使他更坚定地在斗争中探索前进。尽管鲁迅一时还找不到革命出路在何方,思想上感到苦闷和彷徨,但他并没有忘记战斗,而是迫切期待着新的革

命风暴的来临。

二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是一场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从这时开始**“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中国出现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伟大时代的到来，使鲁迅精神大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而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出现的文化革命的新气象，更增强了他的信心和力量。于是，他迅速摆脱了寂寞和苦闷，以新的姿态勇敢地投入了战斗。

早在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封建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猛烈抨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为其服务的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尖锐指出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血淋淋的“吃人”的历史，标榜“仁义道德”的“孔孟之道”是反动统治者的“吃人”之道。这篇讨伐“孔家店”的战斗檄文，为“五四”运动作了舆论准备。自此以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等二十多篇优秀小说，以其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内容，“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鲁迅还适应斗争的需要，运用杂文这种尖锐锋利的文体，向反动思想堡垒“孔家店”猛烈开火，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写了《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要人们发扬战斗精神，去冲破“节烈”、“孝悌”等封建礼教的罗网，打倒孔老二的偶像，从而动摇封建统治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鲁迅又连续发表了“随感录”式的大量杂文，痛斥了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指出复古派反对新文化运动，硬要用“朽腐的名教”来毒害人民的思想，禁锢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群“现在的屠杀者”。

在“五四”运动高潮中，鲁迅发表了《随感录五十六“来了”》和《随感录五十九“圣武”》等杂文，对反动派诬蔑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反动论调，严加驳斥。其中《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一篇，鲁迅热烈地赞颂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愤怒地揭发了古今压迫者的横暴。在文章中鲁迅呼吁中国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新世纪的曙光”的照耀下，学习“有主义”的苏联人民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以顽强的战斗来抗拒和消灭以“刀与火”为基本内容的强权政治，砸烂压迫者利用孔孟之道来粉饰强权政治的思想牢笼。

一九二一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天开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党领导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人民革命的滚滚洪流面前，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一方面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祭起“尊孔读经”的黑旗，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鲁迅坚决反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刮起的复古主义妖风。当时，封建复古派

梅光迪、吴宓等创办的《学衡》杂志，首先向新文化运动反扑。鲁迅在《估〈学衡〉》一文中，指出他们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招牌，不过是一群穿洋服的“假古董”，揭露了他们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效劳的丑恶面目。一九二五年，以军阀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提倡尊孔复古，读经救国，进行封建教育与奴化教育，愚弄广大人民，直接维护反动军阀的统治。鲁迅在《答KS君》和《十四年的“读经”》等文中指出他们办的《甲寅周刊》，是军阀政府的“半官报”，它的出现反映了腐朽的封建势力的绝望挣扎，不过是宣告复古运动死亡的“讣闻”。

鲁迅自一九二〇年秋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生活在生气勃勃，富有革命精神的青年学生中间。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怀青年，开始和进步青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一年，鲁迅还写了小说《风波》，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九二一年，鲁迅又写了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通过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阿Q的典型形象，提出了启发农民觉悟，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重要问题，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对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把他送上断头台的血腥罪行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与批判。

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发生了急剧的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公开投入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怀抱。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消极动摇，逃离战斗。鲁迅见到先前是同一战线中的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感到有一种“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似的寂寞，禁不住呼喊：“新的战友在那里呢？”他积极寻找新的战友，决心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更顽强的战斗。胡

适之流贩卖洋奴买办文化，与封建文人结成反动同盟，大搞媚外复古，向“五四”运动猖狂反扑。他们先后抛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好政府主义”等反动口号，反对马列主义的传播，企图把革命青年从反帝反封建的战线上拉入“研究室”，埋进“故纸堆”，从而维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到一九二四年底，胡适还纠合了资产阶级买办文人陈西滢、徐志摩等人，拼凑了“现代评论派”，充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喉舌，疯狂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化新军，跟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对这股逆流，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在《未有天才之前》、《青年必读书》、《灯下漫笔》等杂文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之流以青年“导师”自居，鼓吹封建复古主义来毒害青年，目的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使青年“灭亡”。他号召青年大胆地“蔑弃古训”，与封建文化彻底决裂。所谓“固有文明”，“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反动阶级所统治的中国，“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鲁迅鼓励青年勇敢地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去“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时代。

一九二五年，在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爱国运动，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全国正处在北伐进军的前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面临着覆灭的命运。在南方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震撼北洋军阀统治中心北京的“女师大事件”。当学生奋起斗争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时，鲁迅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时，胡适之流以及陈西滢、林语堂等人打着“正人君子”、“新派人物”的招牌，提倡什么“费厄泼赖”精神，叫嚷什么“反对过激”，挥舞起“中庸之道”的破旗，妄图以此瓦解革命人民的斗

志，挽救北洋军阀的灭亡。鲁迅密切配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的斗争，于一九二五年年底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论文，彻底揭穿了所谓“费厄泼赖”、“中庸之道”的反动实质，指出“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对反动派决不能讲“宽恕”、“仁慈”，否则以后的革命者“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因此，对一切阶级敌人必须穷追猛打，战斗到底，这便是鲁迅提倡的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当陈西滢等人叫喊“结束闲话，结束废话”，“带住”，妄图掩迹逃遁时，鲁迅针锋相对地宣告：“我还不能‘带住’”，步步深入地剖析了他们是怎样“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相妥协，相勾结，充当帮凶的。鲁迅用他那生动泼辣钢刀一样的笔，击中了“现代评论派”的要害，打到了骗子们的痛处，使其“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证实了鲁迅“打落水狗”主张的无比正确。一九二六年，反动军阀、政客段祺瑞等人一手制造了屠杀徒手请愿的爱国群众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也惨遭枪杀。鲁迅悲愤至极，于惨案发生的当天，就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这篇发射出炽烈的愤怒火焰的文章，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还参加了“女师大”举行的追悼死难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大会，写了感人至深的《纪念刘和珍君》，痛斥和控诉了北洋军阀残杀人民群众的暴行。反动派的排枪，使鲁迅看清了敌人的凶残面目；爱国群众的鲜血，使他目睹了阶级斗争的激烈。鲁迅深刻总结了这次斗争的血的教训，指出：“‘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从心底里高呼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的战斗口号。

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改革社会最快的是“火与剑”，即武装斗争。事件发生后，“现代评论派”等御用文人公开为他们的主子辩护，无耻诬蔑爱国青年是“受人利用”，“自蹈死地”，鲁迅义愤填膺，连续写了许多杂文对他们进行强烈谴责。他把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看成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从英勇牺牲的战士的“淡红的血色”中，受到了鼓舞，“更奋然而前行”。在险恶的环境里，他仍然昂首挺进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

“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所受的压迫愈益加紧，他的名字已上了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名单。这时，大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南方，鲁迅遂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南下，前往厦门大学任教。

鲁迅在厦门期间，热切地关注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胜利的消息使他感到欢欣鼓舞。在厦门，鲁迅继续写作散文集《朝花夕拾》，回顾了自己的战斗历程，认真总结斗争经验，继续探索前进的道路，为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作好准备。

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怀着满腔的战斗激情，到了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中国共产党通过青年党员毕磊等人，加强了与鲁迅的联系，使鲁迅了解党的活动和主张，了解广州和全国的革命形势。当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尚未公开破裂，但斗争已十分尖锐，党内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正在严重危害着革命。鲁迅认识到斗争形势的严峻和复杂。他敏锐地指出：广州的革命如红布标语上用白粉写的字——“红中夹白”，“革命的策源地”也可能变成“反革命的策源地”。他抨击了国民党右派压制工农的罪行，揭露蒋介石一伙利用北伐战争，扩张私人势力，违背孙中山遗教，欺骗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派行径。告诫人们：革